

全球化年代下的親職焦慮與策略： 評 *Raising Global Families: Parenting, Immigration, and Class in Taiwan and the US*

曾凡慈（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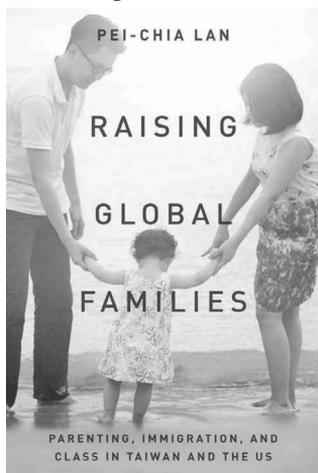
書名：*Raising Global Families: Parenting, Immigration, and Class in Taiwan and the US*

作者：Pei-Chia Lan（藍佩嘉）

出版年：2018

出版社：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圖一：*Raising Global Families*書封



資料來源：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提供

2014年，以東南亞家務移工研究享譽國際的藍佩嘉，一口氣在 *Current Sociology* (Lan, 2014) 與《台灣社會學》(藍佩嘉, 2014) 分別發表分析台灣親職論述及教養實作的相關論文，許多人不免驚訝：「藍佩嘉不做跨國遷移跟勞動了，要轉做親職研究？」這樣的疑惑，終於在2018年出版的 *Raising Global Families: Parenting, Immigration, and Class in Taiwan and the US* 得到更完整的解答 (Lan, 2018)。藍佩嘉依然(部分)是我們熟悉的藍佩嘉：長期關注全球化與跨國遷移的動力，如何影響文化轉變與延續社會不平等，並且擅長以家庭內部的微觀互動為鏡，照見更大的階級、族群與性別體制如何交織，形塑個別行動者爭取並維繫生活機會的能力與限制。當這樣的理論關切延伸到親職研究領域，特別是家庭教養與階級關係這個學界長期耕耘的重要主題，果然帶來令人驚喜的洞見與新意。

Raising Global Families 一書以台灣與美國波士頓的華人家庭為對象，他們來自不同的社會背景，也有差異的親職圖像，但都歷經特定階級的跨國與文化流動，也共享對育兒實作的焦慮不安。本書以「全球化年代的焦慮父母」為導論標題開場，並以「尋求安全」為結論標題作結，中間的章節分述台美兩地不同階級位置的父母，如何試圖駕馭各種跨國流動並協商文化界線，透過多種「全球保安策略」(global security strategies) 來應對全球化世界與變遷社會中的不確定性與不安全感。

第一章概述本書所探究主題的歷史地理脈絡，描繪在不同年代讓台灣與移民父母得以在空間與文化上流動的理念與資源。第二、三章分述台灣中產與勞動階級日益分歧的親職風格與保安策略：由於不均等地參與在全球生產體系中，有感於自身「失落童年」的優勢父母，能夠動員經濟與文化資本，去協助子女取得跨國競爭優勢，或投入另

類教育以規劃孩子「自然成長」；相對地，為經濟所困的勞動家庭，則在政府與學校預設的理想親職框架下，失去教養的合法性，只能藉由嚴教或外包教養工作，期待孩子掙得向上流動的機會。

四、五章則探究移居美國的不同階級華人父母，如何協商文化差異並管理不安全感。實際存在的種族不平等，讓多數中產父母失去文化信心，從而透過競爭同化或培養族群資本等不同保安策略，試圖保護或幫助孩子建立自信。底層家長則苦於失去教養權威（特別是體罰不合法），有人擁抱「美式」風格或修辭來詮釋新的親子動力，有人則尋求族群資源以維繫傳統的育兒實踐。

整體的研究發現，濃縮在〈結論〉頁 173 的表格，精練地對照四組父母——台灣中產階級、台灣勞動階級、移民中產階級、移民勞動階級——各自的階級（不）流動經驗、建構的親職敘事、面臨的制度結構，與他們仰賴的保安策略。然而，作者在結論中特別點出，這些意欲尋求安全的實作，反而弔詭地擴大父母的不安全感：不只是完美的教養總難以克竟全功，新自由主義的修辭也盲於權力結構，將流動成敗歸責給家長個別承擔，整體的社會成本更因此增加，反映在台灣的低生育率、移民子女的情緒壓力甚至心理健康。

這本書最引人入勝之處，除了大量血肉豐實的個案故事，更在於藉由獨到的分析策略，對教養研究的理論化做出重要貢獻：首先，*Raising Global Families* 深化了女性主義家庭研究對於交織分析的重視，甚至超越方法論的國族主義（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將交織的視野提升到對跨國家庭的關注（Few-Demo, 2014; Mahler, Chaudhuri, and Patil, 2015）。透過拆解不同的結構力量如何同時形塑家庭內部的關係與能動性，我們可以看見：同屬移民的華人家庭，在育兒上同樣面臨文化認同危機，但因不同社會位置所面對的制度條件

差異，例如孩子是否能進入名校的「亞裔名額」，或政府介入管教措施，不同階級的移民父母遂藉由詮釋自身流動經驗，發展出異質的保安策略。而台灣的家庭，則是歷經壓縮現代化與全球化帶來並存的多元文化，使位於不同社會空間的父母，對孩子面臨的風險與日後生命機會發展出差異的感知，也會動員階級甚至族群特定的資源，來為孩子鋪設未來生涯路徑或確保安全。

在這樣的分析當中，可看出作者有意識地避開將這些結構性類別視為靜態的、或是內部同質的預設，而採取更關注「過程」與「差異」的視角：一方面，階級同時被概念化為家庭所面臨的異質機會結構（位在不同國家脈絡中，並且是為特定族裔與階級位置的家庭所打造），以及父母所能動員的資源總量與類別；而與之交織的族群文化，則體現在經常衝突的教養腳本（例如華人的與美國的、傳統的與現代的），同時劃分並再製既存的社會界線。另一方面，這些結構類別的社會意義同樣不是固定不變，例如族裔身分與連帶，可能是歧視的來源，也可能因為全球經濟局勢的變化（如中國崛起），或是國家發展路線的轉變（如台灣的南向政策），而帶來有助於競爭流動、值得擁有與累積的資本；這些結構力量對個別行動者的影響也非決定性的：父母會經由反思而建立起親職敘事，從而可能重構慣習，開展出階級與族群內部差異的教養實踐，儘管不見得能在主流社會中取得合法性。

再者，許多教養研究常聚焦單一類別的家長群體，而這本書所使用的「關係」取徑，不只呈現這些家長在不同社會空間中進行親職實作的差異，更能突顯他們如何在結構上彼此牽連。這種關係之一是跨國性的：在全球化的年代，跨國流動本身成為一項足以區分群體差異的資本，為所有困於在地的家庭帶來競爭失利的風險；文化、教育

資源乃至於人力的跨國雙向流動，也讓異地的育兒連結與實作成為可能。父母得以持續進行跨國參看，協商孩子的教育選擇、文化認同或強化對未來全球流動的適應與競爭。二是階級之間的結構關聯，特別是透過各種體制性權力所鞏固的特定文化實作，延續甚至強化既有的不平等。例如台灣的中產階級家長為確保孩子安全的各種親職策略（培養跨國競爭資本或規劃自然成長），不只墊高了親職標準，並透過教育改革與政府監管風險家庭等制度，讓勞動家長更感到自身的親職實作失去合法性，孩子的未來也更不安全。類似地，移民中產家庭努力增進孩子的學業競爭優勢，卻鞏固主流社會對華裔子女作為「模範少數族裔」的刻板印象，致使無法大量投資子女的勞動家庭，或無法達成同等成就的孩子備感壓力。

此外，在關注教養與階級文化的研究取徑中，這本書帶入對家庭生活情感政治的關切，從而能夠有別於既有文獻常將親職視為追求利益極大化的行動，重新將教養概念化為處理不確定性與不安全感的保安策略，以回應全球化對於階級流動與文化認同帶來的諸多挑戰。易言之，位於不同社會空間的父母，會對全球化流動形成不同的風險認知，並建構特定的策略，以確保孩子現在與未來的安全。相較於視育兒為理性的資本累積，並傾向將家長描述成具有事業精神的主體，保安策略的框架更有助於呈顯本書試圖捕捉的真實育兒情境——父母們的日常教養策略，往往並沒有通盤計畫，也常常不是目的明確的行動，而是充斥著對衝突責任的情感掙扎，以及對結構限制的防禦性回應。

身為讀者，一方面深深佩服作者舉重若輕的功力，能在高度複雜且變動的經驗現實中，以統整多重層次的理論與分析架構，解開交織的結構動力與關係；一方面也感覺書中有些未竟之處，特別許多早已

存在、卻未能進一步組織的細節，若能被整合進本書的論述，或可讓理論貢獻與經驗圖像更鮮明也更全面。

首先是關於「孩子」的角色。隨著晚近兒童研究興起，孩子作為行動者的概念已愈來愈受到學界認可；但在教養相關研究中，仍少見將子女形塑親職的行動能力納入考慮（例外者如：Chin and Phillips, 2004; Cook, 2009; Goh and Kuczynski, 2009）。事實上，教養必然是發生在親子協商的過程中，孩子的天生氣質與後天好惡也都會影響家長的教養決策。例如 Tiffani Chin 與 Meredith Phillips（2004）藉由中產父母如何為孩子安排暑期活動，來探問教養實作與階級再製的關聯，卻有耐人尋味的發現：孩子的能動性顯著地促進或干擾這個過程，包括孩子本身的價值傾向，如喜歡卡通、電玩勝過博物館與暑假作業，以及他們自己具備的資本（child capital），包括專注力維持度、學術技能、社交網絡和文化資本（後兩者讓他們比父母知道更多「小孩的活動」），都可能限縮階級因素對孩子暑期經驗的解釋力。

事實上，*Raising Global Families* 並非完全沒有看到孩子的行動能力，特別是在移民勞動階級，作者指出孩子經常比父母更具語言能力，也更熟悉美國的社會體制，有能力扮演協助家庭近用制度資源與機會的中間人，或深諳如何訴諸外部權力來挑戰父母權威；移民中產階級的家庭當中，則有不只一位家長表示：孩子的抵抗使他們不得不鬆動承繼自文化慣習的傳統管教價值。但有趣的是，台灣家長對自身教養的說明，即使是中產家庭也相對較少聽到因孩子而做出調整，彷彿父母都能依其理想或現實條件而貫徹原本的教養理念。如果訪談資料確實如此，如何解釋這樣的跨國差異，也是另一個有趣的議題。

其次是親職研究經常關注的性別關係，有點訝異 *Raising Global Families* 一書中的相關討論處處珠璣，卻在結論中缺乏統整性的分

析。尤其是關於不同社會空間中父職如何轉變的描述相當令人驚豔，包括台灣中產階級的「太空人父親」(astronaut fathers)如何協商衝突的性別腳本(養家活口與親職投入)、維繫與孩子的關係；底層父親何以傾向透過暴力來修復因勞動市場變化與跨國婚姻張力而受損的陽剛氣質；以及移民父親因美國社會的「竹子天花板」(bamboo ceiling)或福利陷阱，而將生活重心轉向教養子女，在在張顯出性別、階級、族群在全球化場景中的交織性。與此同時，母職的角色看似呈現較多的延續性？好像全球化下加劇的不確定性與不安全感，只是持續強化或更精細化既有的母職腳本(雖然原本就是複數的)？特別讓人好奇的是那些將父職視為人生目標的家庭，母妻的角色又是如何因應？

再者，作者在最後特別指出，這些個人化的保安策略其實加劇了集體層次上的不安全感。但我也想追問：在不同的家庭之間，有哪些集體連帶的可能性，有助於克服親職過程中的種種焦慮不安？書中部分章節其實給予我們一些線索，例如令人印象深刻的台灣「花園小學」(Garden School)的母親們，即使有人必須與丈夫分居兩地，卻能藉由連結其他理念與生活風格相似的母親，讓她們有更多社會資本來累積文化與物質資源，力抗外界對於投身另類教育的質疑。移民的家庭也經常參與同族裔的社會網絡，其意義或許不限於培養子女的族群文化資本，或作為族群經濟提供家長輔助的教育資源，對於家長來說，這種參與亦可能有重獲歸屬感與得到社會支持的效果。

最後是關於親職經驗本身的探問。作為同樣關注教養實作的研究者，關於如何看到、以及需要在多大程度上看到，親職實作中必然同時存在的苦辣酸甜，我總是覺得有點困惑與困難。我永遠記得某次一位媽媽帶著被診斷出注意力缺失的孩子來受訪，個性剛強的母親在描

述孩子症狀對教養帶來的挑戰時，難掩怨忿的情緒，但訪談過程中，孩子總是扭糖似地黏著媽媽，媽媽也不時岔出題外，跟孩子互捧臉頰、親暱微笑互望。在細數跟孩子之間因症狀而生的千百衝突之後，我問母親還有沒有什麼要補充的，母親想了想，說：「沒有，剩下的都跟 ADHD 無關了。」¹我當下驚覺，若非親眼看到他們互動，而只聽母親敘述、甚至只看訪談紀錄，我一定只會記住各種掙扎、辛苦和挫敗，無法感受到他們居然是這麼相愛的母子。那些超出訪談範圍的、「跟 ADHD 無關」的生活片段，那種彼此依偎、微笑互望的深刻牽絆，或許才是支撐母親持續接下孩子給的各種課題的真正動力？而不（只）是責任感、社會壓力，或是母職規範。

Raising Global Families 從全球時代的焦慮開始，以保安策略作結，並且終究還是著眼於父母的不安全感，或許跟受訪者理解的研究議題設定有關。如同書中提到，中產父母總認為自己是因為成功教養而受訪，勞動家長則擔心孩子是否在學校惹了什麼麻煩。當大學教授邀約訪談，被想像成檢驗家長的教養成績單時，可能有些經驗及其特定的詮釋就被消隱了。那些或許是：各種方向不一的栽培與規劃，同時帶動父母的人生轉向（例如那些為子女移居的家庭），反而看見原本意想不到的人生風光；而或許孩子經常脫出安排，卻還是能長出自己的模樣，讓家長益發鍛練出足以承擔更多不確定性與不安全感的韌性與勇敢。而或許如同我的受訪者所說，那些「都跟 ADHD 無關」。也或許看似無關的，其實深切相關。

1 ADHD 為注意力不足過動症之英文縮寫。

參考文獻

- 藍佩嘉 (2014) 〈做父母、做階級：親職敘事、教養實作與階級不平等〉，《台灣社會學》，27: 97-140。doi: 10.6676/TS.2014.27.97
- Lan, Pei-Chia (2014) Compressed modernity and glocal entanglement: The contested transformation of parenting discourses in post-war Taiwan. *Current Sociology*, 62(4): 531-549. doi: 10.1177/0011392114524509
- Lan, Pei-Chia (2018) *Raising global families: Parenting, immigration, and class in Taiwan and the US*. Redwood C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in, Tiffani and Meredith Phillips (2004) Social reproduction and child-rearing practices: Social class, children's agency, and the summer activity gap. *Sociology of Education*, 77(3): 185-210. doi: 10.1177/003804070407700301
- Cook, Daniel Thomas (2009) Children's subjectivities and commercial meaning: The delicate battle mothers wage when feeding their children. In Allison James, Anne Trine Kjørholt, and Vebjørng Tingstad (Eds.), *Children, food and identity in everyday life* (pp. 112-129).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UK. doi: 10.1057/9780230244979_7
- Few-Demo, April L. (2014) Intersectionality as the "new" critical approach in feminist family studies: Evolving racial/ethnic feminisms and critical race theories. *Journal of Family Theory and Review*, 6(2): 169-183. doi: 10.1111/jftr.12039
- Goh, Esther C. L. and Leon Kuczynski (2009) Agency and power of single children in multi-generational families in urban Xiamen, China. *Culture and Psychology*, 15(4): 506-532. doi: 10.1177/1354067X09344881
- Mahler, Sarah J., Mayurakshi Chaudhuri, and Vrushali Patil (2015) Scaling

intersectionality: Advancing feminist analysis of transnational families. *Sex Roles*, 73(3-4): 100-112. doi: 10.1007/s11199-015-0506-9

◎作者簡介

曾凡慈，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助研究員。興趣領域為醫療社會學、科技與社會，以及性別研究。近期投入的主題包含嬰幼兒發展的風險治理，兒童注意力缺失過動症的在地歷史、醫療實作與親職經驗。

〈聯絡方式〉

Email: fttseng@sinica.edu.tw